

论语易解

《论语》与《周易》的对话

戊戌刘大钧

孙福万
——
著

上

2000年来对《论语》别开生面的全新解读
深入探索《论语》与《周易》的内在联系!

团结出版社

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刘大钧教授题写书名!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教授作序!

国家开放大学孙福万教授潜心十年力作!

論語易解

戊戌劉大鈞

《论语》与《周易》的对话

上

孙福万——著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论语易解 : 《论语》与《周易》的对话 / 孙福万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26-6321-3

I. ①论… II. ①孙… III. 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③《周易》—研究 IV. ①B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9566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6 开

印 张: 41

字 数: 550 千字

印 数: 5045

版 次: 2018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6321-3

定 价: 88.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黄裕生序

阅读经典的三个境界

我们是一个有文化经典的民族，这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意味着，不管进入什么时代，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经典获取深度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启示，获取存在的力量与勇气。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背负着一个使命，那就是在每个时代都需要去重新理解、会通这些经典，以使每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能够维持在应有的高度上，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于是，如何阅读这些经典，也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人类文明越发达，书的种类也就越多。但是，正如对于不同美食，要有不同吃法一样，不同种类的书，也需有不同的读法。就读法而言，我们可以把书大致分为这样三类。

一类通常会是我们读得最多的书，就是以浏览的方式阅读的书。我们读这类书或者是为了补充一些知识（特别是一些非专业性的知识或普及性的知识），或者是为了消遣，或者是为了心灵的解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但是，我们在生活中还需要与各种人、各种事物以及各种行业打交道，这就需要不断补充各种知识；同时，我们还会有空闲需要排遣，需要让心灵摆脱俗务，到想像世界去漫游，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放飞心灵，这就需要文学作品。由于这类书或者比较浅显、通俗，或者比较有趣、生动，所以，可以随时随地以比较快的速度阅读。我们在床头放的，在旅途上带的，通常就是这类书。

第二类是专业书，虽然各种专业书的内容千差万别，但都需要以专注、精准的方式阅读这类书籍，因为这类书通常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包含着严格的概念定义与逻辑推演。由于需要弄明白其中的精确定义、专业用语以及学理关系，所以需要特别的专注与反复的理解，以便准确掌握。这类书一般不能像前一类书那样，可以零散地阅读，而要求持续、系统地阅读，否则就无法形成一个专业所要求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由于阅读这类书籍是为了掌握立业技能，最终是要能应用于工作领域，因此，阅读这类书籍的速度以每个阅读者掌握知识的速度进行，既不可能像阅读第一类书那样快，也不可能像阅读第三类书那样从容。

第三类书就是文化经典，包括思想经典、艺术经典与宗教经典等。这类书首先要求正襟危坐地慢读、精读。这类书成为经典，是经过长时段的历史筛选确定下来的，既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某个读者所能决定的。而这类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则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它们所属的那个文化传统与历史进程在一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它们因此甚至是一个时代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而构成了时代之间的关节点。因此，进入这些经典也就意味着进入不同时代而穿越着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也只有真正进入这些经典，才进入了历史并生活在历史之中，或者说，历史也才作为一个历程而活在我们的生活中，而不是作为已完成了的事件被尘封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只有进入文化经典，他才真正生活在历史里，历史才真正存在于他的生活里，否则，对他来说，历史只是外在的，而未来则只是近前的。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民族，如果没进入文化经典，也就是意味着其生活或存在不可能有历史的厚度。

然而，正因为如此，要进入这些经典并不容易。它首先要求以慢速度的方式与从容的心态去阅读。这些经典的深度或高度通常就体现在它有很自洽的学理体系，哪怕看起来只是随意的对话或编排。只有读出这种自洽的学理体系，才意味着读懂了一部经典。这就不只是需要相关的知识（比如语言知识与历史知识等），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理解经典文本所讨论或面对的所有问题及

其回答。简单说,需要达到对文本的整体把握。这就要求在语句与段落、段落与章节、章节与整个文本之间不断进行反复对照、求解、互证,也即“解释学”所说的在部分与整体之间进行充分循环。所有人文经典都需要在这种充分的解释学循环中才能被深入理解与通达。这意味着,从容慢读是进入文化经典唯一可靠的方式。

如果按理解的深度来区分阅读这类经典的层次,那么,在文本内部完成的充分循环,只是理解文化经典的第一境。由于这类经典是时代的标志,是穿越历史的各个关节点,因此,它们的意义,它们的地位,与其他经典有直接相关性。这意味着,每部文化经典的意义与地位应被置入与其他经典的关联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呈现。用解释学的话说就是,这类经典的语境超出了每部经典的自身文本。当然,所有文本的语境都超出了自身文本,但是,每一部文化经典超出自身的语境都要比其他一般文本更高远,却又更明确,这就是其他文化经典。也就是说,其他文化经典构成了每一部这类经典的具体语境。

不过,这“其他文化经典”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他“文化经典”,一种是“其他文化”经典。

阅读文化经典的第二境就是把这一经典文本置于与其他“文化经典”的对质中进行理解。这里所谓其他“文化经典”,也就是指同一传统、同一语言里的经典。在这些经典中,都有一部类似源头性的经典,比如中国的《易经》,犹太-基督教的希伯来语《圣经》等。对这部源头性经典的理解,固然要从其文本本身出发,并在自身文本中进行充分的有效互释,但是,其源头的质朴性、开放性、丰富性需要在之后的其他经典那里呈现其展开与实现,需要在其他经典那里得到新的见证,并借此呈现它的真理性意义与源头性地位。至于其他经典,既有必要与之前的经典(包括源头性经典)对质,也有必要与之后的经典互释。通过前者,可以知道一部经典突破了哪些方面,周全了哪些环节,深化了哪些问题;而通过后者,则可以显明这部经典的突破与深化开出了什么样的后境,引向了什么样的新见证,以及它被突破的局限。这样理解出来的经典是历史中的经典,是经典互文中的经典,而不是孤零零的经典。因此,从任何一

部经典中理解出来的“道理”将会是一种穿越历史、贯穿时代、融入生活的道理，而不只是书本上的道理，不只是遥远时代的道理。

这意味着，一旦登入阅读经典的第二境，也就真正进入了历史，也才真正进入了历史。换个角度说，历史也才打开人们的胸怀，人们的胸怀也才怀抱着历史：可以站在经典在历史里所确立的高度与广度去理解、看待世界。于是，由文化经典支撑起来的历史厚度才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从第二境看，没有经典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厚度。

不过，阅读文化经典还有第三境，那就是将经典置于与“其他文化”经典的对质中展开理解。很显然，这里的“其他文化”就是指另一种传统的文化。所以，“其他文化”经典也就是属于另一种传统的文化经典，或者说，是造就了其他传统与历史的文化经典。这另一种传统的文化经典构成了本传统的文化经典的真正他者，同时也是本传统的经典能获得理解与解释的最大、最遥远的语境。

就内容而言，任何一个传统的文化经典之所以能够造就传统，开辟历史，乃在于它包含着能够教化人类、引导人类、凝聚人类的真理。经典所达到的高度的提升，所达到的广度的扩大，根本上乃是对人自身、对世界以及对人与世界（包括人—神）之关系的认识 and 理解的深化，而实际上也就是真理的深化。真理的这种深化展现为两个方面：丰富性的增加与普遍性的提高。我们不知道对世界的认识会有多少个视角，也不知道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会有多少个路径。但是，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真理的深化，认识的升级，就在于通过不同视角的融合来获得对世界更全面的认识，通过不同理解路径的会通来获得对人自身更深层次的认识。实际上，由不同文化经典开辟出来的不同传统，其根本不同不是对象的不同，因为所有文化都要面对人自身与世界这一共同的对象；它们之间也不是问题的不同，因为人类不管在何种处境下都要面对生死存亡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们之间的真正不同是视角与进路的不同。这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特别是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的相遇，是一个相互提供出不同参照系，以及寻求能把更多视角都容纳进来的更大参照系的事件。获得一

个更大的参照系，是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相遇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一个必然出路。虽然在这个更高的参照系里进行对世界的审视、理解与认识仍然是带着视角的，因而仍然是有限与片面的，但是，这样的认识与理解因其融合了更多视角而更具丰富性，也因其能容纳更多差异而更具普遍性。

因此，不同文化传统的经典的相遇既是人类走向更高普遍性的事件，也是人类走向更高普遍性的必由之路。如果说“大自然”（也许也可以称为“天”或“神”）通过产生不同文化传统来使人类从尽可能多的视角去认识、接近整全的真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拥有文化经典的文化民族负有一个额外的使命，那就是通过会通其他传统的文化经典来提高人类的普遍性存在、普遍性原则的水平，以便开辟新的、更具普遍性的世界史。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经典的第三境既是最难达到的，却也是今天的人们最需要努力达到的。在全球化处境下，要使世界的普遍之道肉身化为世人之道，唯有通过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的对质、会通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对自己传统的文化经典的放弃是对真理的不负责任，那么对其他传统的文化经典的拒斥则意味对真理的盲目排斥。不管是对自己传统的文化经典的否定，还是对他者文化经典的拒斥，实质上都是放弃对世界普遍之道、天下普遍之理的寻求和努力。

孙福万教授新著《论语易解》首先所努力的就是跳出单一文本的自我循环的限制，试图以经解经，经经互释。在这部著作里，作者以《易》解读《论语》，当然也可以说是以《论语》对质于《易》。《易》历来被视为诸经之首，百家之源。而孔子与《论语》无疑是《易》通向儒家的关键环节。以《易》解《论语》既可呈现《易》的儒家面相，也可见证儒家思想的源头性与突破性。所以，作者在书中表达了诸多新见、新解与新识。

虽然作者只是在两部儒家经典之间进行互释，但是由于作者受过很好的西学训练，所以他的这一互释工作自觉不自觉地还带着另一个文化传统的视野。这使他的解读经典的工作明显地朝着第三境界努力。这特别体现在作者在这一工作中对普遍之道的自觉与追求。尽管我们不一定都赞同作者的一系列具体观点，但是他的普遍主义精神，以及他努力的方向无疑是特别值得肯定

的。因为我相信，这是研究、理解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应当坚守的精神，都应努力的方向。虽然每一种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如果过度强调自己文化的这种独特性，以致不惜以特殊主义去理解、解释和维护这种文化，那么，这不只是在自己与世界之间制造隔离带，而且是在自废本文化所可能具有的世界性意义。

2018年4月10日于清华园

王新春序

写在《论语易解》出版之际

《论语》与《周易》是活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两部历久弥新、影响深远的经典，它们都与孔子密切相关。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思想的直接经典，《周易》则是在以孔子思想为灵魂的《易传》的创造性转化下获得全新生命的。

生当春秋末叶的孔子（前551年—前479年），面对当时的“礼崩乐坏”局面，以其显豁的人文价值理性意识之自觉，与既直面社会人生之现实、更着眼其长远未来的深沉理智态度和卓越前瞻性大视野，审时度势，一则艰难疏通了西周初期所完备起的礼乐文化，再则更为这一浸润着人文精神的文化由人自身那里寻得了其内在真切可靠的价值根基，即“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学而》）的仁，从而在寓作于述的方式下建构起仁礼合一的全新文化价值系统，指明了他所认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意蕴之所在及人生的应然方向，首次开显出人的自足人文生命理性意识，令人在拓展人文价值化的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挺立起自己生命的主体性，以此而确立起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并被公认为达致最高圆融生命境界的圣人。

人的发现，是西周以来的时代主题，孔子首先是这一主题的契接者。众所周知，主要当系滥觞于祭拜神灵的巫术宗教活动的礼乐，历夏经商之后，在人的发现的时代主题下，转化为时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最终出现了此一形态下的整体思想文化价值系统，成功奠定了中华作为一礼乐之邦的根基。上述系统一反以往礼乐的基本巫术宗教神学品格，而豁然高标人文之精神。它贯

通天人，立足于天人之整体和家国天下之整体的宏大视域，以天人之沟通契合与家国天下之平治而秩序化、和谐化为其终极核心诉求。它透过祭祀礼乐的具体仪式、活动，一则表达了人对于天的敬畏与感恩，再则实现了人与天的感通，三则营造起独特的神圣庄严氛围而熏染、震撼人的心灵，激发出人之来自于生命深处的对于超越性存在即天的强烈而深沉的敬畏与感恩之情愫，进入通体纯然的敬畏与感恩的生命状态或境界。它透过祭祀礼乐的具体仪式、活动，也表达了人们对于以德配天而创立、传承人生德业的先王、先圣、先祖的敬畏与感恩，并借此彰显出先王、先圣、先祖所表征的人的价值以及人们对此价值的高度自觉与肯定。而透过在世者各种场域下繁缛不紊、有章可循的种种交往礼乐仪式、活动有节有度的具体实施，它又彰显出对于各种社会角色和充任这些角色之人的正视，以及在此正视所许可的限域内对于充任相关角色之人的善待；彰显出对于通体洋溢着人文精神的礼乐制度、社会秩序的敬畏与善待；彰显出人道与天道同样的神圣与庄严。在它的有效甄陶下，天人息息相通，天地人物相连一体，构成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这一世界，逐步迈向礼乐化的富含人文价值意义的世界。置身于其中的人，也成为礼乐化了的人。礼乐既获得了超越性之天的根源性意义，又获得了直接性的生命存在本身之存在上的究竟意义，化而为人上以通天、下以贯人的基本生活样式，生活态度，生命存在方式与气象。

依孔子之见，礼乐文化的大传统，由先圣先王创构传承而来，已是先于后人的既定历史性存在。它在天人关系、社会人生、个体生命存在方式与安身立命之应然，以及何以达成这些应然诸方面，皆有详明而正大之开示。后人无需再从起步阶段进行一步步的艰难摸索探究，只需将其与自己置身的时代接通，会通出时代新意，即可在上述诸方面确立价值明觉，相当便利地落实一切，推展一切。因之，面对上述传统，后人的精神向度，自当豁然归于自觉认同与感恩、敬畏一途。感恩、敬畏之，进而感恩、敬畏创构传承它的先圣先王，守望先圣先王借传统所高标的崇高、神圣价值。基于是有此契接，才会在文化自觉下与先圣先王所创构传承下来的礼乐文化的大传统接通，与以往的历史接通，

并在接通的基础上，承先启后，转化礼崩乐坏之乱局，理顺现实人生，开启整个生活的世界理想之未来。

契接礼乐之统，也就意味着对于人的发现的时代主题的契接。继此契接，孔子着力突显了礼乐之统在直接性的生命存在本身之存在上的究竟意义，予以自觉的此一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进而并从人自身那里为其寻得了真切可靠的价值根基，即仁。仁被诠释为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崇高价值。人本身直下即成为拥有崇高价值的存在。由此，德不再仅仅是超越而外在之于天对于人的生命品质之应然的强制性要求，它即转而为人所内在地涵具；礼乐不再仅仅以此超越之天为其价值根基，其直接的根基转而内在于人的生命存在之中。礼乐之统有了来自于生命存在本身的价值根基与直接承当，与人的生命存在接通。仁礼合一的全新哲学文化价值系统最终建构完成。孔子由此不仅契接，而且全方位深化、升华了人的发现这一主题，令其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从而守正开新，光前裕后，开启了中华文化的主流走向，成为中华文化的伟大象征。《论语》一书成了上述一切的直接文献见证。

包括经与传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周易》一书，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原典，备受历代人士尊崇，对传统哲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其他典籍所罕能与匹的作用，赢得了“六经之首”、“大道之源”、“三玄之一”、“性命之源”等美誉。《周易》其书关系着中华文化的基因与中华民族的基因，牵动着几乎传统每一位读书人的文化神经。以至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晚年对其爱不释手，“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即将编连《周易》古经竹简的皮条翻断了多次。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易》的《要》篇也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汉代杰出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乃说：“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而南宋学者叶采，也才会有其如下题为《暮春即事》的诗作：“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易传》决定了易学发展的未来走向，向来被视为孔子的作品，就内容而言，孔子思想是其灵魂所在。

《周易》源乎卜筮活动,《易传》之后,由它所引发的易学,则以象数、义理合一为架构,以接通天地、感通天地人物、藏往知来为期许,开显了一种涵纳天人,通贯古今,放眼未来,着眼宇宙人生价值应然之境的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易传》诸篇相继问世之后,易学作为一具备自身特有话语系统而特色鲜明的专门之学正式形成。因乎作为经典文本的《周易》经传之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因乎《易传》之对古经解读所初步确立起的诠释之融旧铸新的高度原创性学术方向,易学获得了旺盛不竭的神奇学术生命力,一直处在生成、日新的鲜活生命状态之中。这一状态,一则决定了易学的未完成性,一则决定了其向纵横两个方向深化、拓展的潜在可能性与现实必然性。就主流而言,历代易学家,置身于各自相应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以各具鲜明时代特征的理解视域,持续对文本《周易》经传作着带有程度不同之原创性的哲学诠释学意义上的诠释与阐衍,令易学新意迭生层现,使易学理境后妙新前妙,以此而铸就了与时偕行,日新不已,蔚为大观的易学衍展之长河。汉唐经学时期,《易》与诸部经典被奉为法天地以设政教的王者之书,由易学的天人之学促动,出现了经学第一个全面发皇并跃为官方法定意识形态时代的天道为人道之终极价值根据、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基本天人关系理念。《易》即此被汉唐经学推尊为经中之经,奉为法天地以设政教的最高王者之书。礼乐刑政之王道义理,遂成为其核心内涵。魏晋玄学兴起,《周易》又被玄学化的义理易学,视为明时通变的玄学义理的载体。而自从理学开山周敦颐于《通书·诚上第一》断言“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之后,《周易》又成为以心性论为根基的贯通天人的理学思想的深层理论根柢,着眼心性义理以说《易》,又成为理学家解读、阐发《周易》之强势主流。由此《论语》与《周易》两部经典相益互补,成为中华文化的两部难以被越过的宝典。

福万教授本科在山东大学求学期间,受教于恩师刘大钧先生,对《易》产生了浓厚兴趣,有了初步的易学学养积淀。毕业后,负笈京师,在人民大学李质明先生门下研修外国哲学,渐次确立起融摄古今、会通中西、面向未来的开放学术胸襟与视域。毕业后,他以国家开放大学(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平台,

积极从事以中西文化会通为基调的教学科研工作，成果丰硕，产生了令人赞叹的社会影响。近年来，他又在微信公众号“玩易斋”上，连载《论语》与《易》会通的《论语》诠释析论大作，受众面与量迅即扩大，反响强烈，对中华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产生并继续产生着日趋广泛深入的积极影响。这部大作基于《周易》由天道下贯人道、《论语》由人道上达天道的精准判断，章解句释《论语》文本底蕴，进而引证《周易》以与之互诂互显，既深化了对《论语》的理解，也点化了《易》的意蕴，读之胜义迭现，受益匪浅。早已两鬓染霜的我，遥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叶与福万教授一同在山东大学求学的青葱岁月，我俩课上课下的同窗美好兄弟情谊，历历在目般闪现，令人感慨系之。今见福万教授这一大作即将付梓，给更多人受益提供了可能，感到由衷高兴！福万教授让我说几句话，推辞不过，谨以以上拉拉杂杂的话语，作为对本书出版的祝贺，与对福万教授同窗兄弟之情的抒发。

戊戌春日于山东大学

自序

左手《论语》，右手《易经》

在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当中，有两部著作，其重要性和巨大的影响力，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我指的是《周易》和《论语》。或许可以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周易》堪比基督教的《旧约》，《论语》堪比基督教的《新约》；也就是说，在终极价值的导向维度上，或许它们的地位和基督教《圣经》不相上下。

我们知道，《周易》一向号称“五经之源”“三玄之冠”“群经之首”，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关于《周易》在中国文化中的至尊地位，李学勤先生甚至有过这样的说法：“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而“经学的冠冕是易学”（马宝善《易道宇宙观》序），其中“易学”指的就是关于《周易》（《易经》）之学。

那么，《周易》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这或许首先和它最初是一部卜筮之书有关，它通过“吉凶悔吝”等占辞直接指向人们的利害关系，所以很容易耸人视听；其次，《周易》大概是古今经典当中唯一一部以“图（卦画）”“文”（卦爻辞）结合表达自己思想的书籍，它构建的庞大象征体系具有巨大的解释空间，其细致精密程度至今让人叹为观止；再次，《周易》不仅包括古经两篇（即上经、下经），还包括《易传》十篇（即《十翼》），不仅有传统的象、数、理、占四大研究领域，还通过因应时代，向几乎所有领域渗透而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学科，期间经、传、学、术之

间不断激荡，从而成为孕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股永不枯竭的“活水”。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经常说，《周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特点、价值追求和人文精神，乃是一部常读常新的活的文化经典。

而《论语》呢？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关于《论语》一书的重要性，有很多种说法。比如“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盖孔子犹如基督教中的耶稣，尽管孔子从来没有像耶稣那样以“道成肉身”的形式、以“神之子”的形式示现，但他却也声称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本人的“道统”意识，或担任中国文化的“续命者”角色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的。而其弟子子贡也明确盛赞孔子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当然后代帝王对孔子的各种封号就更不用说了。就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言，此诚如柳诒徵所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无论从哪种角度说，这恐怕说的都是事实。因此之故，记载这样一位中国文化之完美代表的言行事迹的著作，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日渐影响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是毫不奇怪的。

那么，同样是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巨著，《周易》和《论语》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对它们进行会通研究呢？

首先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当然还是孔子。孔子不单是《论语》的主角，经过孔子赞《易》而形成的《易传》，也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宝库。以往人们对于孔子赞《易》，除了欧阳修《易童子问》表示过一点怀疑之外，基本上都是承认的；但自20世纪以来，在时代思潮的裹挟下，“古史辨”派等人曾对此予以否认。好在随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易》的出土以及中国人文化自信的

逐渐恢复，这种论调现在已经大大减少。我们看帛书《要》篇，就明确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这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描写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等等，何其相似乃尔！因此，现在学界一般都承认，今本《易传》的文字或许并非孔子本人亲自撰写，极有可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编写而成，但其核心思想肯定是属于孔子的。

我们知道，孔子在易学发展史上同样具有崇高的地位（班固《汉书·艺文志》曾谓“《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将孔子列为“三圣”之一），其易学核心思想在今本《易传》和帛书《易》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在帛书《要》篇中，孔子曾对子贡说过这样一段话：“《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稀）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刘大钧先生对此评价说：“（过去）人们占卦是为趋吉避凶，而孔子则认为通过‘德性’与‘仁义’的修养亦可达此‘求福’‘求吉’的目的，故与史巫‘同途而殊归’。此旨即经孔子改造之后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易》。”当然，从历史上看，“脱离神道设教而以人事伦理释《易》者，孔子非第一人”，但毫无疑问，“孔子在将《周易》由卜筮之书向人文化成之书的转化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孔子或其弟子以《彖》《象》《系辞》《文言》等说《易》，已基本上脱离卜筮，多以人事说之了。”（《周易纳甲筮法·再版前言》）据此而言，孔子在以人文主义释《易》方面，功莫大焉！这其实就是说，正是通过晚年赞《易》，孔子将《周易》这部卜筮之书变成了儒家的一部哲学著作（故在传统儒家学者看来，《周易》经、传是不能割裂的，此可参见马一浮、金景芳等人观点）；而如此一来，《周易》和《论语》这两部著作在其价值取向或内在精神上也就完全联系起来了。

的确，单从表面上看，《周易》和《论语》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周易》是由基于阴爻、阳爻组成的卦画和基于卦辞、爻辞组成的经文两者交织而成